目　　录

解放黔西南　建立新政权……夏德义（1）

黔西南地区一份重要的历史文件……
——兴仁专区农民代表会议决议
……兴义县泥函区档案室提供……（20）

整编原保安独立第三师的经过……苗遂之（26）

进军贵州片断……董心波（30）

守卫兴仁城防的八连……龙树德　方良玮（39）

麻山事件前后……卢惠龙　陈德安搜集整理（43）

解放兴仁地区点滴……孟继舜　邵　平（57）

艰苦的战斗　胜利的会师
回忆滇桂黔边纵三支队与五兵团十七军胜利会师的经过
……何志翔（62）

身陷叛军历险记……陈培月（71）

将台营攻守战……谢正权　许廷义（7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望谟解放前后……罗兴贵　卢先政　王封常（86）

坡敖寨“三·八”匪祸……汛　河（99）

尾宜丫口动车案……袁仁华（104）

纳盘战斗侧记……韦朝云（109）

蒲东狗夫妇死难记……王安明（114）

密林深处

——活捉匪首王少华……陈德安（119）

王伯群……熊宗仁（126）

王文华……熊宗仁（137）

龙李倒周……刘德一（145）

安龙的沿革及概况……房　健（159）

普安县概况……《普安县文物志》供稿（162）

兴义大红袍……陈金茂（165）

解放黔西南　建立新政权

夏德义

一九四九年，我人民解放军全线突破了蒋介石国民党的长江防线，所向披靡，势如破竹。敌人一溃千里，纷纷向西南和两广逃窜。为了切断敌人的退路，全歼逃敌，我军在解放广州后，于十一月十五日解放了贵阳。随着云南省卢汉宣布起义，我军又接管了昆明。至此，国民党十九兵团和保安部队三个师共一万五千多人被压缩在黔西南地区，完全处于我军包围之中。迫于这种形势，十九兵团代总司令王伯勋、八十九军军长张涛、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于十二月十日在普安通电起义。过了两天，原兴仁专署专员兼黔西南绥靖区司令谭本良又在兴仁起义，接着保安部队的三个师也相继宣布起义。根据我方的命令，起义部队就地待命，等待整编。原国民党的专、县、区、乡政府一律改称解放委员会，等待接管。从此，黔西南人民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我随五兵团解放贵阳市。中共贵州省委和省军区随即在贵阳建立办公机构，开展工作。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军区派人送信给我，通知我与贵州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张立同志一道去接受任务。接通知后的第二天上

午，我去贵阳南厂兵营的军区司令部。到达办公室时，省军区副政委王辉球同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石新安同志已在等着。我们刚坐下，省委副书记徐运北同志也来了。王辉球同志向我们介绍了黔西南的概况：它位于南盘江的东北面，北盘江流经境内。全境多崇山峻岭，形势险要，是滇、桂、黔三省的结合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所辖的十县是：兴仁、兴义、盘县、普安、晴隆、关岭、贞丰、安龙、册亨、望谟。境内有汉、苗、布依、彝、回、仡佬等十几个民族，人口二百来万。王辉球同志又向我们介绍了黔西南起义部队的状况，决定我们组织工作团去兴仁专区。任务是：宣传全国的解放形势和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安定起义人员的情绪，掌握情况，做好改造起义部队和接管政权的准备工作。讲话中，他交给我一份工作团的名单。之后，徐运北同志介绍了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我地下党及其三个游击团的情况，指示我们与他们取得联系，搞好会师，团结战斗，一道工作。临离开司令部时，王辉球同志又叮嘱说：关于起义部队的具体情况，你们路过安顺时，我十七军的同志还会给你们作详细介绍。

接受任务后，我与张立同志根据王辉球同志所给的名单组建军政工作团。工作团共有六十余人，主要成员有：团长张立，副团长兼支部书记是我。成员中有九个县团级干部，其中南下干部有孟广涵、黄辅忠、杜良俭、阚伐夫、刘锋、高广运、周明轩。地下党的干部有张鸣王、刘熔铸，其余都是渡江后组建的二野军大五分校的学生和在贵阳参加工作的学生。

我们工作团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从贵阳驱车前往兴义，当天下午到达安顺，由十七军政治部的同志安排住

宿在一家私人旅馆里。在安顺休整八天。这期间，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向我们介绍有关方面的情况：这里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文化和交通落后，封建势力顽固，起义部队的成分复杂；蒋介石、国民党在逃离西南前搞了一个“应变计划”，潜伏下大批特务，甚至在有些区、乡和连队都作了安插。为此，蒋介石曾在南京召见了贵州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谷正伦和保安副司令韩文焕，面授机宜。从我方的力量看：此时主力部队在外线作战，可以依靠的有活动在盘县、兴义、安龙、普安、晴隆五县属滇桂黔边区罗盘地区领导的游击队，还有活动在贞丰、册亨、望谟、关岭一带的由贵州地下党和罗盘区分别领导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根据这些情况，工作团拟定了一个开展工作的计划。

十二月二十八日，我们从安顺启程，前往兴仁。途中山脉纵横、岗峦起伏、深谷泻泉、险峰峭立、道路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汽车十分颠簸。加之缺乏汽油，乘坐的木炭汽车边走边摇，速度很慢，直到一九五〇年元月三日下午太阳偏西时才到达兴仁城。当时，起义部队已接到省军区的通知，王伯勋、张涛、王景渊、谭本良等起义将领组织有一批人在西门外列队欢迎。进城后，我们在八十九军军部会议室（原是一个资本家的住宅）稍事休息，便安顿在原专署隔壁的四川会馆内。

兴仁城周围，峻岭连绵、山石嶙峋，长满灌木和杂草。城墙还保存得完好，城楼的砖缝和瓦檐中长着稀稀疏疏的几茎杂草，在微风中摇动。城墙不知建于什么年代，只有那斑驳的残痕流露出岁月易逝的淡淡迹印。城内一万多人口，除了国民党军政官员、地主、商人，多数是手艺人或轿夫之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贫民。市民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狭窄凌乱的街道只有数十家店铺，鸦片烟馆却随处可见。民房低矮破旧，阴暗潮湿。相形之下，起义部队八十九军所在的一座中西式两层楼房显得格外触目。街上，不时有苗族或布依族人背着蔬果山产来城里兜售，换些盐巴或日用品。这期间，盐巴奇缺，价格昂贵。三三两两起义部队的官兵，或酗酒于市肆，或吸鸦片于烟榻，往往寻衅闹事，城内秩序显得动荡不安。对我们工作团的到来，城内贫苦人和起义部队士兵是欢迎的。但慑地主恶霸和反动军官的势力，又不敢公开接近我们。还有一部分人则抱怀疑观望的态度。这里没有电灯，晚间除了鸦片馆昏暗闪忽的灯光，街上一片漆黑。夜里，躺在床上听到远远近近的狼嗥，其声低沉而长，忧郁凄惨。间或还可以听到后山的虎啸，嚎然一声，空谷回响，经久犹存。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团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首先是接触起义部队的上层人物。到达兴仁的第二天下午，十九兵团的将领在司令部设宴招待代表团负责人。后来谭本良又以个人的名义在原专署请代表团负责人吃饭，王伯勋、张涛也参加。借此机会，我向他们说明了来意，表示欢迎他们弃暗投明，回到人民方面来。王伯勋、谭本良、张涛等也多次检讨自己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有罪于国家和人民，愿意将功赎罪。工作团到达后的第三天，我们把起义部队团以上军官和政府县科以上人员集中起来召开会议。约莫四、五天后，我们又在兴仁中学操场集中了起义部队十九兵团驻兴仁的官兵和部分群众召开了一次大会。通过这些会议，我们向他们宣讲全国的解放形势，宣传党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宣传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一九四九年

十一月向滇、黔、川、康四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十项通告。

其次，广泛接触起义部队的中下层官兵。我们组成了几个工作组，决定工作团的杜良俭、蔺伐夫、刘锋、高广运、周明轩五名县团级干部各带领一个工作组到起义部队的团和县政府开展工作，宣传形势，宣传政策，宣传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十项通告，使起义人员认清形势，坚定走奔明投明的道路，稳定情绪。在开展宣传中，注意了解情况，及时掌握起义人员的思想动态。

在这段时间里，工作团抓紧与滇桂黔边区领导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我们到达兴仁的第二天，罗盘地委派了地委委员王纲正同志和地委委员兼边区纵队二十一团政委甘东等同志来与我们联系。次日下午两点多钟，在我们住处的小会议室里见了面。我记得王纲正同志当时戴着一顶军帽，上身穿着破破烂烂的灰制服，脚穿草鞋。随他一道来的还有六、七个中层干部。地下党的同志长期与敌人作秘密斗争，环境十分艰苦，见面时彼此都很激动，他们称南下的同志为“老大哥”。我说，你们长期坚持地下斗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是有功之臣，要向你们学习。现在，我们都是在中央领导下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我们要搞好会师，团结一致，互相配合，搞好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地下党的同志与敌人打过多年交道，对当地情况熟悉，有利于我们对黔西南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的深切了解，也使我们的力量壮大起来。我们初来兴仁时，警卫由起义部队八十九军负责。鉴于当时的形势，我们决定撤掉起义部队的警卫连，由边区纵队二十一团派出一个主力连担任工作团的警卫，并由

兴义游击团政委龙树德同志亲自率领。从此，有了地下党同志的配合，我们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二）

随着形势的变化，一九五〇年元月中旬，贵州省委、省政府决定将兴仁工作团改为军政代表团，由军大五分校政委李一非同志任团长，我和杨江、张立同志任副团长。与李一非同志一起来的还有从五兵团补训师抽调的孟继舜、常锡春、刘子珍、赵金山、陈培月等六十多名干部和战士。军政代表团的任务是接管政权，改造起义部队。在组织上实行党政军（包括游击队）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军政代表团一成立，就积极作出部署，调兵遣将，设法改变我方与起义部队的均势，用以钳制起义部队，保证整编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这项部署，我五兵团四十九师配合四野在云南沾益歼灭国民党陆军总部后就回师兴仁，并决定该师一四五团驻盘县、普安、晴隆一线，一四七团驻兴仁、贞丰、安龙、册亨、望谟一带，兴义则由游击团驻防。这样，对起义部队中的反动分子、动摇观望分子起着一定的威慑作用。

接管国民党政权，改编起义部队，先是采取派军代表的办法。一般派到起义的各个连队和县政府。军代表的任务是：宣传全国形势，宣传党的政策，掌握起义部队的动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军代表给起义部队的官兵讲政治课。内容有：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关于人民军队与国民党雇佣军队的本质区别；关于我军的优良传统。同时，有计划地与起义官兵交朋友。当时，不少连队还张贴了鼓动标语，教唱

革命歌曲。起义部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接管起义部队和旧政权的同时，我们宣布撤销各级解放委员会，从上到下建立起人民政权。建立政权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干部配备。当时，黔西南地区干部有随军南下的，有由部队转业的，还有来自于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按党的干部政策，从有利于团结、有利于革命事业出发，一视同仁，统筹考虑，交叉安排，让南下干部与地下党的干部互相配合。兴仁地委和行署的领导班子是这样配备的：

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李一非
地委副书记兼专员　　夏德义
地委委员、副专员　　王纲正（地下党）
地委委员、副专员　　苑重新（南　下）
组织部长孟广泽　　（南　下）
宣传部长甘　东　　（地下党）
专署办公室主任张鸣正　　（地下党）
专署公安处长马正坤　　（南　下）

军分区的班子：

政　委　　李一非
司令员　　汪家道
副政委　　夏德义
参谋长　　杨　昆
政治部主任　　吕　鸿

兴仁地委所属十个县的第一任主要领导人：

兴仁县委书记　　刘熔铸　　（地下党）
县　　长　　张　俊　　（南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兴义县委书记	王纲正（兼）（地下党）
县　　长	黄辅忠（南下）
贞丰县委书记	蔺伐夫（南　下）
县　　长	周民轩（南　下）
普安县委书记	龙树德（地下党）
县　　长	吴兴德（南　下）
安龙县委书记	张连琛（地下党）
县　　长	杜良俭（南　下）
晴隆县委书记	靳子明（南　下）
代　县　长	何祖岳（地下党）
关岭县委书记	仇复荣（南　下）
县　　长	何永源（南　下）
盘县县委书记	齐岗（军队干部）
县　　长	高尚荣（南　下）
册亨县委书记	孙敦启（南　下）
代　县　长	高广运
望谟县委书记	刘　锋（南　下）
县　　长	祝永绪

各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等领导干部也是按照上述原则配备，因年代已久，姓名已无法一一回忆。由于这样安排，各方面都比较满意，团结得也很好。虽说当时干部少，但显得很有力量。

政权建立初期，按照中央的政策对起义旧职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方针，分别按照不同情况，安排他们的工作。不过一般只让他们担任副职，要害部门由我们派人领导。

（三）

新政权建立不久，一九五〇年三月前后，贵州全省匪风突起。黔西南的国民党起义部队也陆续出现小股叛乱。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为了防止事态的发展，消除隐患，减少对兴仁的压力，我们要求省委、省军区把驻黔西南境内的起义部队十九兵团所辖的两个军五个师调离兴仁地区。省军区考虑了我们的要求，将上述起义部队调往安顺、贵阳一带集训整编。地委和军分区又决定把可能发生叛变的余启佑保安二七二师西调盘县，使其处于我四十九师主力一四五团控制之下，以便对其改造整编。果不出所料，保安二七二师师长余启佑是个非常反动的家伙，三月十三日在去盘县途中，公开杀害我军代表，率部叛变。事情一发生，我军四十九师首先派侦察科长王巨胜带领两个连兵力尾追。随后，四十九师师长兼军分区司令员汪家道同志又亲自率领四十九师驻兴仁的主力追剿，追至盘县北八大山将其大部歼灭。余启佑带着五百多名残兵败将逃窜了。鉴于这种形势，为了防止起义部队的继续叛乱，经省军区同意，迅速对驻在贞丰一带的原国民党保安独立第三师起义部队收缴武器，进行徒手整训。这件事办得比较顺利。

余启佑溃逃后又与各地地主恶霸相勾结，以黔桂交界处的连绵大山为掩护，到处进行破坏活动。他的叛变对其它起义部队产生了极坏的影响。继之而起的是有的反动军官自动离队，有的拉出小股上山，有的地主恶霸也组织土匪武装叛乱。据估计当时每个县都有土匪二、三千人之多，全区多

达三万。当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土匪欺骗、裹胁来的群众。这些土匪打着“反共抗俄纵队”、“中国反共救民军”等形形色色的旗号，按纵队、大队、中队、小队编制。他们从袭击我工作队，拦路抢劫，发展到围攻我地委和专署所在地——兴仁城。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二日我们获得情报，知道土匪要打兴仁城。当晚地委和军分区的负责人召开了会议。记得当时李一非和吕鸿同志已去贵阳开会，会议由汪家道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四十九师参谋长杨昆、政治部副主任张新田、侦察科长王臣胜等人。会议分析了形势，强调要稳定民心，防止内乱，并且对城内的力量进行了分工：四十九师司政后机关组织干部战士坚守城外几个碉堡；三个直属连队作为机动力量待机出击；地委和专署机关的武装交通股和全体机关干部都组织起来站岗放哨。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散会前，我交待了交通股股长孟继舜和常锡春等同志，要他们把谭本良、张曾复等二十余名起义部队的首领请到代表团暂住一夜，保护他们的安全，防止发生意外。

第二天天刚亮，几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我刚起床，来人报告说，土匪围城了，四周山上土匪走动的身影都能清楚看见。不一会城外枪声愈来愈紧，我立即按照预定的计划，赶到西南城楼指挥所。此时，汪家道同志正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指挥前沿同志坚守碉堡。我也用望远镜看了一会。只见城西南泥堡方向的土匪人数较多，枪声很紧。顺风时听得到他们断断续续的嚷叫：“活捉×××专员！”“活捉×××师长！”“打进兴仁城活捉××党！”气焰十分嚣张。由于我们全力阻击，土匪始终未敢进城。大约上午九点多钟，为了击退敌人的进攻，汪家道同志与我简单研究

了一下敌情，决定集中力量打西南方向那股叫嚷得最凶的土匪。并派了两个连，一个连从南门正面迎敌，另一个连从北门向西南迂回，卡住敌人。当我们的出击部队接近敌人时，汪家道同志说："怎么样，老夏，可以动手了吧？""可以了！"我赞同他的意见。汪家道同志随即命令架在城楼上的两门八二迫击炮开火。"匡——当""匡——当"，炮弹在土匪群中炸开。顿时，硝烟弥漫，土匪乱作一团。隐蔽在敌阵地附近的我军两个连乘势出击。土匪遭到伤亡，纷纷溃逃，其它方向的股匪见势不妙，也逃之夭夭。这次战斗，俘获土匪五十多名，还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

土匪围攻兴仁城虽然失败了，但并不甘心。他们仍然到处用特务刺探我情报，寻找机会袭击我基层政权和军政工作人员，进行骚扰破坏。一九五〇年五月，我由兴仁去兴义部署剿匪等工作，随我一道的还有四十九师通讯连的两个班作警卫。这一路岗峦起伏，山道崎岖，两旁灌木丛生。乘着木炭汽车，翻山越岭，忽上忽下，速度很慢。车行至距兴义北二十多公里的涧潭沟，刚绕过一座小山，"叭叭叭"，车后突然三声枪响。顿时，东面的山上枪声大作，子弹象蝗虫似的呼啸着向我们飞来。预先埋伏在路旁灌木和草丛中的土匪一窝蜂冲向我们，并嚎叫："抓活的！抓活的！"我们紧急刹住汽车，由于通讯连的战士缺乏实战经验，临阵有些慌乱，处境异常危急。此时，我的警卫员手部受伤。我急忙从他手里夺过卡宾枪，与一位排长和二位班长仓促应战，顶住敌人，同时组织部队反击。土匪毕竟是乌合之众，经不住我机枪、卡宾枪的猛烈火力，很快溃退。我们乘胜追击，将土匪赶过两个山头。这次战斗打死打伤土匪八人，缴获步枪两

支。我方一位副班长和一名机枪手牺牲，负伤四人。在战斗中，我的右腿也负了伤。回去的途中，大家沉默不语，看见牺牲的战友在涧漕沟流下的殷红血迹，想起他们平时的音容笑貌，心情十分沉重，一股对土匪仇恨的怒火在胸中燃烧。后来查明，原来我们从兴仁出发的时间被特务所掌握，头天晚上就暗中报告了匪首曾明辉，所以遭此伏击。由此可见当时黔西南土匪猖獗之程度。

在贵州土匪猖獗的严重时刻，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对贵州剿匪斗争作了明确指示，把剿匪斗争作为“解放大西南”的第二战役来打，并规定了具体方针政策。对全省的剿匪工作，省委和省军区有统一部署。兴仁地委和军分区也有具体部署。总的精神是，发动和依靠群众，集中优势兵力，与人民武装相互配合，进行清剿。

遵照省委、省军区的部署，剿匪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一九五〇年三月到八、九月，放弃册亨、望谟、安龙、兴义；构筑碉堡，集中力量，先歼叛匪，扭转战局。一般至少以一个连或两个营以上的兵力对股匪跟踪追击，歼灭顽敌。这种做法能够击溃敌人，打掉土匪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斗志。但由于土匪地形熟悉，又凭借大山老林掩护，难以彻底歼灭。后一阶段，在总结前一阶段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实行军民结合，拉网合围的办法。这样所费时间较长，但能彻底清剿土匪。当时各个县都成立了人民武装自卫团，属县人民武装动员部领导，各区成立大队，乡成立中队，村成立小队。部队和群众武装在省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下，由北向南，拉开大网，实行合围。其中盘县、晴隆、贞丰、兴义等八个县在地委和军分区的具

体部署下，以县为单位，组织拉网清剿。册亨、望谟和盘北是由地委和军分区组织力量，统一指挥，拉网合围的。围歼都是有计划地一块一块的清，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搜索。我军对册亨、望谟地区的合围进剿，从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二日开始，十三、十四两天就解放了册亨、望谟两县县城。在战斗中歼灭了匪“六纵队司令”毛竹君以下七百零二名。到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册亨、望谟合围胜利结束。俘匪“中国国民党自救军总司令”，潘方侠等团以上匪首九十二名，击毙匪“第七集团军司令”吴中坚等团以上匪首十五名，缴获各种枪支五千六百八十二支，匪首十八名投降。第二次解放了册亨、望谟两县全境。这也标志着贵州剿匪斗争的胜利。黔西南人民欢天喜地，安居乐业。

在一年多的剿匪斗争中，黔西南广大军民历尽艰险，英勇战斗，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我们的许多干部和战友为了黔西南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中有南征北战、经受过枪林弹雨考验的老战士，还有初出茅庐、稚气未脱的青年学生。他们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黔西南人民的心中。由此，我深深地感到，革命事业总是艰难地向前迈进，每前进一步都要我们付出血的代价。夺取政权是这样，建立和巩固政权同样是这样。比之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先烈们，如今我们这些幸存者还有什么个人的得失值得计较呢！

（四）

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是我们解放黔西南，建立和巩固新生政权的一项重要工作。

黔西南地处边陲，历来被称为蛮荒瘴疠之地。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恶霸手中。他们与土匪勾结在一起，组织武装，修筑据点，贩卖毒品，残酷剥削农民，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广大农民终年辛劳，食不充饥，衣不蔽体，困苦不堪。偏僻山区不少青年姑娘都没有衣服穿，只得用一块破布遮住下身。有的人家没有衣服穿，冬天只得光着身子围着火堆御寒。出门就得小跑，借以取暖。目睹此状，令人心酸。拯黔西南人民于水火之中，刻不容缓。

一九五一年初春，树梢已透出新芽，但严冬的寒意尚未消退。兴仁地委和专署在兴仁城召开了全区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共有代表四百多名，会场设在兴仁中学礼堂。会上成立了贫雇农协会（简称农会），选举了农会主席和委员。主席是李一非，副主席是我，委员有各县县委书记和地直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还有贫雇农积极分子。农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贫雇农，广泛发动农民群众，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打倒地主恶霸，配合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清剿土匪，巩固政权。会后，各县和乡村也相继建立了农会。村有村长，农会有主席，这样，新政权在农村有了一定的基础。

与此同时，地委和专署部署继续深入地开展减租、退押。当时地主恶霸利用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农民十分残酷。一般每亩地租高达三成到五成之多。押金（即高利贷）高达四到六成。农民终年劳累还是不得温饱。为了解除这个燃眉之急，我们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和黔西南的具体情况，规定取消押金，地租也只能使地主有微利可得。这样，农民从实际利益中感到新生政权是代表自己利益的。这就从思想上和组织上

为下一步开展镇反和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日，我和李一非同志到贵阳参加省委召开的第二届党代会。会上，省委第一书记苏振华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同志主持的西南局会议精神。主要是初步总结了剿灭成股土匪的经验，指出形势的发展要求开展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巩固新生政权。在这次会议上，苏振华同志还代表省委总结了贵州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认为剿匪斗争中对群众有所发动，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他还分析了贵州封建地主阶级的特点：土地少但集中在少数地主恶霸手中，这些恶霸多数有武装，甚至私设监牢，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很残酷。因此，贵州地主阶级是以封建恶霸为代表，不镇压这些地主恶霸和反革命，群众就发动不起来，土地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会议确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在这次会议上，省委对土改工作做了具体布置。

省委会议结束后，我和李一非同志迅速返回兴仁，向地委传达了这次会议的内容，研究了贯彻西南局和省党代会精神以及在全区开展土改和镇反工作的方法和步骤。传达中，我们强调了贯彻党的“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的阶级路线。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强调了镇压反革命。为了加强领导，地委又作了分工：李一非同志抓群众运动，我抓镇反。地委还根据省委的部署，决定地委抓三个乡，各县县委抓一个村或一个乡的土改试点。试点工作既要取得经验，又要培养干部，把那些准备作为今后面上土改工作队负责人的干部都集中在地、县委的试点乡，既作为点上的力量，又让他们学习开展土改工作的经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